

大学起源要素探析与 中国大学体系建构

——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

邓磊¹, 刘琴^{1,2}

(1.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2. 重庆市第二师范学院纪委办公室, 重庆 400067)

摘要:大学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知识需求与职业分工。在大学形成的过程中,既有必然的一元决定因素,也存在偶然的多维影响因素。必然因素赋予了大学传承至今的主体功能,偶然因素则促成了大学组织的多种形态。大学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各种知识诉求作出回应,为社会生产和人的发展提供最广泛的智力支持,通过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将国家诉求、市场需要和个体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中国大学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史为鉴,结合社会生产的链式体系,根据人们生活的多重需要,有针对性、分层次地构建多元立体的现代大学体系。

关键词:唯物史观;大学起源;中国大学体系;大学使命;知识担当;智力支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2-0001-06

大学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关于大学起源的研究却长期不甚明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的起源隐秘而复杂,“没有创建人,或者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没有明确的记录”^[1];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史研究者自身的原因,这是不可否认的。国外历史学者关于大学起源的研究通常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站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大学的立场上对研究对象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进行宏大叙事;另一种则是从某些中世纪的相关资料中管窥蠡测。笔者认为,以唯物史观为视角,能够兼顾主体选择和社会条件,深入剖析大学起源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现代大学体系的立体建构,可以为中国大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一、必然与偶然:大学起源的社会条件

(一)理论视角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确切趋势,偶然性则是不确定趋势;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具有必然性,非本质联系和外部联系则具有偶然性。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居于主导地位;偶然性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处于从属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重视必然性、忽视偶然性在一

收稿日期:2016-12-14

作者简介:邓磊,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刘琴,重庆市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古典大学生活史与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2015JY032),项目负责人:邓磊。

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决定论的局限性。比如在大学诞生的时间和形态问题上,此理论很难解释大学为何出现在蒙昧黑暗的中世纪而不是文化昌明的古典时代,也很难解释在同一历史阶段出现的欧洲古老大学为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强调“主体选择论”的现代唯物史观则可以对这一问题形成很好的补充。“主体选择论”在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注重人的主体选择因素,既强调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也承认主体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历史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主体的活动,主体总是通过选择、实践和创新不断突破历史的限制,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2]。综合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便可以对大学起源的根本原因和多重要素进行分析。

(二)社会背景

大学起源于12世纪。此时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以拉丁古典著作研究为核心的早期文艺复兴开始出现。中世纪欧洲历史研究的权威专家哈斯金斯认为,12世纪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时代。这是十字军的时代、城镇兴起的时代、西方最早的官僚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式建筑步入顶峰,哥特式建筑开始兴起,方言文学开始出现,拉丁古典著作、诗歌和罗马法走向复兴,吸收了阿拉伯人成就的希腊科学和大量希腊哲学得到了恢复,并且诞生了第一批欧洲大学”^[3]。

在此之前的数个世纪,欧洲古典文明几乎被入侵的北方蛮族破坏殆尽,一度繁荣兴盛的欧洲社会陷入深重的蒙昧状态。而基督教徒却由于隐居潜修躲过了劫难,并逐渐成为欧洲仅有的文化传承者。9世纪以降,久乱思治的欧洲社会初步形成了宗教(教皇)、政治(君主)和文化(教育者)三权鼎立的基本格局。大学在此背景下缓慢出现。

(三)根本原因

大学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知识需求与职业分工。首先,由于11世纪欧洲各国商业往来日趋频繁,人们对知识,尤其是对法律知识产生了迫切需要。12世纪,城市逐渐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和物产,行业开始集中,由此出现了职业化的行会组织。教师与学生也组成了学者行会,它脱胎于商业行会,并逐渐发展为具有“法团”性质的大学组织。其次,由于加洛林王朝教育改革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复兴。教会理论亟需完善,封建王国渴求人才,社会亟需用理性和知识去战胜混乱和蒙昧,由此知识分子和文化机构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再者,由于蛮族入侵导致城堡林立,进而促使市民阶层广泛兴起。政治秩序的重建又为大学组织的诞生创造了客观条件。最后,由于基督教会的发展为欧洲思想的同质性和文化沟通的便捷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会的内在需要以及教权的广泛存在直接导致大学的出现。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上述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从具体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来看,则具有偶然性。比如:巴黎大学的问世归功于巴黎城的政治功能以及学术大师阿贝拉尔的卓越成就;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则取决于法学权威欧内乌斯的社会影响以及教皇、君主两强争斗留下的权力真空;牛津大学的形成主要缘于英法两国交恶而导致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滞留本国的偶然契机。

二、一元与多维:大学起源的主体选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分析历史现象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论,但也要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考察。探索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一元之“唯”,与思考历史现象采用视角的多元之“维”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支持。

(一)一元决定因素:生产发展带来的知识诉求

根据“一元多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世纪大学的诞生首先取决于11世纪至12世纪欧洲生

产力发展的社会现实,这是一元决定因素。

10世纪以降,饱经战火的欧洲社会日趋稳定,生产力逐渐恢复。铁犁等先进农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欧洲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繁荣。为了购买原料、组织生产和销售产品,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向港湾、河口、城堡、寺院等交通枢纽和政治文化中心聚集,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封建领主也纷纷参与中世纪城市的兴建活动;或者默许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城市,让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的手工业者;或者主动参与商业活动,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城市的兴起是中世纪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促进了一个依靠技术和知识的市民阶层的形成,而且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先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庄园制度逐渐瓦解。城市与王权的结盟,也大大加强了后者的权力,使得天主教会统一封闭的权力格局开始被打破。具体而言,城市对大学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城市的兴起为大学的出现提供了场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大学有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学与城市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在繁荣的城市,往往能够产生广纳天下学子的传世大学。“一般来说,创建一所大学机构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其地理和气候上的优势:淳朴的民风、有益身心的新鲜空气、丰富多样而价格低廉的食物等等,这些都有益学生的身心健康。”^[4]集中的人群、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这些都是城市为大学提供的基本条件和有利因素。

另一方面,城市还为大学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城市对大学的资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减免租金,比如牛津大学从13世纪后期起就在城市当局与教授团联合管理机构的裁决下,被免除租住公寓的一半租金;二是直接向学者发放生活补贴,比如牛津市政府每年定期向贫困学者发生活补助;三是当学者与市民发生冲突后,大学往往会获得大量的经济补偿;四是政府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向贫穷学子提供补贴;五是私人捐赠,这也是中世纪大学最重要的经济收入。中世纪大学经常接受来自贵族、主教甚至平民的捐赠,捐赠者提供的大量资金不仅保障了大学的运转和贫困学子的入学,而且还为其内部自治奠定了物质基础。时至今日,私人捐赠仍然是许多西方大学重要的资金来源。

(二)多维推动因素:宗教、政治与文化的影响

除经济发展的一元决定性因素之外,大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其他多维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导致了大学的多重形态。

1. 宗教信仰的影响

中世纪宗教信仰的广泛性促成了知识的统整性,进而又导致了大学“内在性格”的普世性。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信奉一个真理:在教会之外得不到拯救。基督信仰带来了相似的社会意识和统一的社会结构。教会宣扬审慎、庄重和对一切基督徒的慈善,这种基本规范和精神信仰的绥靖作用取代了强力镇压,成为欧洲精神世界的一道“围墙”。教会的主要制裁不是武力,而是逐出共同体,其中最严厉的手段就是逐出教会。被逐者的命运极为悲惨,不仅肉体四处游荡,精神上也无所归依。在广泛认同的基督意识基础上,教会通过推行宗教教育培养传教人才,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继承和弘扬的作用,由此建立起广泛的意识形态认同。一言以蔽之,宗教信仰为大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交流平台,不仅塑造了大学的“普世性格”,而且还赋予大学超越世俗的组织追求。

2. 古典文化的影响

古典文化传统的一致性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大学兼具国际性和本土性。一方面,欧洲古典文化传统为大学提供了基本统一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地区习俗的差异性导致了大学形态的多样性。比如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古典文化传统意识因屡遭破坏而变得十分淡薄,因此查理大

帝得以实施政教合一的君主统治,从而加强了学校与修道院、主教座堂之间的亲密关系。隐世苦修的修道院出于对修士毅力的担忧而倾向于选择一种脱离世俗生活的推理知识,因此形而上学、神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知识在此大行其道,神学圣地巴黎大学便应运而生。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欧洲地区,古典文明遭受的破坏较少,古典文化尤其是罗马法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因此诞生了法学渊藪博洛尼亚大学。

3. 政治格局的影响

政治格局的离散性导致大学组织形态的多样性。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教皇拥有精神世界的绝对权威,教育亦被教会控制。因此,修道院或者与修道院有依附关系的学校成为法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场所。而地处南欧的意大利等国则是比较纯粹的封建君主制国家,教会势力只具有一定的调和作用,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并且传承自古罗马的市政制度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而形成了自由宽松、充满活力的市政生活氛围,使南欧教育带有浓郁的世俗色彩和实用特征,所以才出现了博洛尼亚大学等坚持自治理念和实用精神的大学。

三、反思与启示:中国大学的主体功能与多元取向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辨析大学的起源,可以得知影响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因素是一元而多维的。因此,现代大学体系的建构,也应当在明确认识一元必然因素的同时关注多维偶然因素,促使大学的主体功能与多元取向并行而不悖。

(一)现代大学的主体功能与中国大学的知识担当

从大学诞生开始,知识性和公共性就决定了大学的基本功能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作出回应。大学的这一基本功能已经被古典大学的不断衰落、研究型大学的强势兴起以及服务理念的广泛传播等一系列历史演变所证明。时至今日,随着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又提出了一个核心诉求:大学必须为社会生产提供最广泛的智力支持。这种智力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专业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则是科学技术创新。二者是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一体两面。大学的核心是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都是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在不同方面的体现。

有鉴于此,中国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要对中国社会的知识诉求作出回应。大学所提供的知识不仅要面向内部的所有个体,同时还要积极面向外部的社会成员。通过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将国家诉求、市场需要和个体利益有机地联系起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最广泛的智力支持,是现代大学存在合理性的体现。

在当前的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大学应当综合考虑大学的历史起源和当代实践,兼顾学术研究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从职业规定、道德诉求、政治责任和社会功能等维度去思考自身的知识担当。具体而言,大学的发展必须以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为核心,但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绝非闭门造车、自圆其说,亦不止于诸种演绎归纳、实验论证。中国大学的知识担当应当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进程,以民族文化为土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鹄的,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

(二)现代大学的多元取向与中国大学体系建构

大学从源头开始便因为多维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组织形态的多重选择性。在现代社会,由于不同国家的发达程度、政治诉求和文化传统互不相同,各国大学不必一味地相互模仿,但可以彼此借鉴。同一国家的大学也因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和人们生活的丰富性而必须避免同质化,应正视社会生产的链式体系和人们生活的多重需要,有针对性、分层次地进行现代大学体系建设。因此,正在努力迈向卓越的中国大学,也应当以当前社会特征和主体需求为基础,广泛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多

元立体的现代大学体系。

1. 组织体系

从组织体系来看,大学在创建之初就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呈现出“教师大学”“学生大学”“教会大学”与“国王大学”等多种形态。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大学模式:“专注于研究的洪堡模式、侧重教学的拿破仑模式以及致力于在教学和研究之间实现平衡的牛津剑桥模式”^[5]。美国借鉴他国之长,在吸取德国大学和英国大学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型的美国研究生院,并且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的对象。上述各种大学形态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履行并协调大学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功能基础之上的,但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各类大学都不约而同地重视科研,于是大学形态上的差异明显缩小。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学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在于跨越不同的高等教育类型,对上述功能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所有大学都应当创造性地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大学不能各行其是、互不关联,而是应当在教学、科研和服务三大功能方面各有侧重、扬长避短,围绕国家、政府和社会的需要,形成团队,分工协作。

2. 辐射体系

从辐射体系来看,大学在诞生之初就存在“原型大学”和“子大学”之分。当代学者则将大学从广义上分为三大类型——世界级、国家级和地方级,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前者就要优于后者,而是侧重于不同的使命。“世界级大学的使命是惠及世界各国及地区;国家级大学的使命是促进国家的发展;地方级大学的使命则是满足社会的需要。”^[6]照此逻辑,中国大学体系的建构应当综合考虑知识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科研推动力和对国家的贡献程度、技术革新能力与市场参与度等多维因素,分级分层地进行布局。从理论上讲,所有大学都应当在学术上具有世界竞争力,在文化上具有国家影响力,在经济上具有地方推动力,但事实上却不能面面俱到。因此,各所大学都应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共同构建多元立体的现代大学体系。

3. 市场体系

从市场体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形成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贯通机制;二是职业教育向高层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生产的自动化简化了工作流程,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仅需少量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专注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系统并不适用于以高科技为导向的知识社会,而重在培养学生掌握多种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体系则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政策又积极地向研发项目倾斜。因此,在提高科研水平获得国家资助的基础上,大学更需要积极面向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巨大投入是有目共睹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将研发视为提高国家竞争力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研发投入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更应当注重科学研发的针对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课题应当由国家统筹兼顾,而更多的研发项目则应当由市场来决定,由此各级各类大学便可以以国家政策为宏观导向,围绕市场需求组织科研与教学。

4. 教学体系

从教学体系来看,由于后现代社会发展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以及就业市场的变动性,中国大学必须打破原先固化的分科教学模式。新的教学体系应以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导向,综合采用自主教学设计和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等现代教育理念与平台,为学生提供就业和个体发展最需要的“迁移性技能”。“迁移性技能”具体包括:“能够准确阅读并快速掌握各类信息且加以创造性利用的能力;能进行流畅清晰的口头表达及书面记录,以便于能明白无误地将新的信息、问题讨论

的新进展传播与传递的能力;能读懂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中隐含的意义并从各种表现形式中将其抽离出来的能力”^[7]。

总而言之,大学起源的社会因素是一元而多维的。大学起源主要取决于人类社会主体的选择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现代大学的发展在以知识渊薮为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外在形态。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与探索,中国大学已经逐渐走上现代大学体系建设的道路,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体系,应当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在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革新观念,努力实践。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哈斯金斯. 大学的兴起[M]. 王建妮,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
- [2] 曹岚.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重新理解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J]. 探索,2000,(2):66-68.
- [3] 哈斯金斯.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M]. 夏继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 [4] 海斯汀·拉斯达尔.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3卷[M]. 邓磊,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4.
- [5] SHIN J C, KEHM B M.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global competition[M]. Dordrecht: Springer, 2013:3.
- [6] BEN-DAVID J. Centre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7:3.
- [7] 大卫·帕尔菲曼. 高等教育何以为“高”——牛津导师制教学反思[M]. 冯青来,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4-85.

University Origin and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NG Lei¹, LIU Qin^{1,2}

(1.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fic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cuses on the vital function of subject's choices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it also emphasizes the social conditionality; therefore it holds the principle that social being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also emphasizes that history is shaped by multiple social factors. University originated from a series of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natural selection by the social main body, which wa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necessary monistic determinant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multi-dimensional accidental factors. Historical necessity endowed university a basic personality which was inherited till now, and contingency contributed to multiple forms of universit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shall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gard social production chain system and multiple needs of people's life as preconditions, construct a multivariate stereoscopic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special purposes and multilayers.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iversity origin; Chinese university system; missions of the university; knowledge play; intellectual support

责任编辑 秦 俭